

THE ART OF
INTELLIGENCE

Lessons from
a Life in the CIA's Clandestine
Service

国家威胁

中情局谍战亲历

[美] 亨利·A·克伦普顿◎著

Henry A. Crumpton

王之光◎译



CIA

CIA非洲科，CIA秘密行动处，联邦调查局，反恐中心，国家资源司，国务院……

继《艰难一日》后，又一本令美国政府惶恐的书！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THE ART OF
INTELLIGENCE

Lessons from
a Life in the CIA's Clandestine
Service

国家威胁
中情局谍战亲历

Henry A. Crumpton

[美] 亨利·A·克伦普顿 著

王之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威胁：中情局谍战亲历 / (美) 克伦普顿著；王之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

书名原文：The Art of Intelligence: Lessons from a Life in the CIA's Clandestine Service

ISBN 978-7-5086-3864-5

I. ①国… II. ①克… ②王… III. ①中央情报局 (美国) — 间谍 — 史料 IV. ①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41468 号

The Art of Intelligence: Lessons from a Life in the CIA's Clandestine Service

Copyright © Henry A. Crumpto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国家威胁——中情局谍战亲历

著 者：[美] 亨利·A·克伦普顿

译 者：王之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01-2012-7303

书 号：ISBN 978-7-5086-3864-5 / D · 254

定 价：49.00 元

印 张：19.5

印 次：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一生的所爱，辛迪·娄，还有我们的三个儿子。
献给所有做出牺牲、不辱使命的家庭，
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乏人歌颂。

**THE ART OF
INTELLIGENCE**
Lessons from
a Life in the CIA's
Clandestine Service
目 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梦 想	//013
第二章	训 练	//023
第三章	招 募	//037
第四章	情报搜集	//061
第五章	联 络	//075
第六章	反 恐	//091
第七章	联邦调查局	//097
第八章	反恐中心	//113
第九章	阿富汗, 战略	//155
第十章	阿富汗, 行动	//197
第十一章	阿富汗之外	//243
第十二章	反 思	//247
第十三章	美 国	//257
第十四章	政 策	//283

后 记 // 293

译者的话 // 299

致 谢 // 301

2002年夏，我接手了新的任务。我在中央情报局（CIA，中情局）的秘密行动部已经服务了20年，最后10个月还领导中情局介入了阿富汗战争，现在是该换换花样的时候了。

这个任务也是我的一个新起点。别了，MI-17直升机、“捕食者”无人机、M4突击步枪、格洛克19型手枪、镀陶瓷防弹衣、防疫接种、测谎仪、伪装掩护，连最基本的谍报术也不要了。别了，不用躲避跟踪（非必需），不用运作特工行动，不用消除恐怖分子的影响了。然而，新的“任务”却要求我进入一种陌生的文化，调整态度，换换身份。

我又回到了大学，当起了“学生”。

美国中情局给了我学术休假，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访学。这个任务比近期的一些经历更低调，但令人兴奋。我可以在一个完整的学年沉浸于知识之中。我要饱餐一顿涵盖政治思想、军事战略、中国、历史、外交政策、恐怖主义和哲学等课程的盛宴，大量阅读这方面的书籍。我饥渴地吸收这一切。

搜索 2003 年春季学期的课程目录时，我偶然发现了意想不到的课程：情报学。这门课程的名称是“谍报艺术与技术”（The Art and Tradecraft of Intelligence），这吸引了我去研究开课教授詹妮弗·西姆斯（Jennifer Sims）博士的背景。她的简历引人注目，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里。

作为一个仍在中情局领工资的资深情报专业人员，我觉得有义务选修这门课程。同时我也猜想，这门课程内容有趣且很容易学。

课程很有意思。我们探讨了美国的一位著名的间谍大师乔治·华盛顿如何以精湛的战术谍报技巧运作特工行动，然后出色地利用其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我们研究了美国南北战争中谍报能力的进步。我们了解到，林肯总统在白宫电报室度过了很多时光，把它变成事实上的情报和指挥中心。我们跟踪整个 20 世纪无线通信、飞机、雷达、卫星等技术奇迹的创造，研究它们是如何改进谍报工作的。

我们观察到，大多数打造国家安全政策和发动战争的政治领导人不像华盛顿和林肯，他们未能理解或欣赏谍报工作。他们还跟不上地缘政治的变化，部分原因在于情报收集、情报分析和政策执行之间的差距。我们认真考虑了政府和更广泛的社会是如何看待和对待情报人员的，其评论大相径庭，有深恶痛绝的，也有充满卡通式幻想的。对于情报人员无知的期望，有时是不合理的期望，或轻或重地打击了整个美国历史上的谍报人员及其机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对于谍报事业的集体无知，不仅破坏了我们的谍报能力，而且最终伤害了作为其服务对象的决策者和公民。

课程虽然过瘾，却并不容易学。西姆斯博士要求我们投入更多的研究和思考，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不知道我学到了多少东西，想想都令人难堪——即使我有多年的间谍和秘密行动经验，还在几个大洲参与了战争。虽然对自己的无知懊恼不已，我还是痴迷于这段独特的学习经历。

在这段学术假期内，我开拓了眼界，这远远超出了谍报业务所带来的。20 年来这是我第一次不再仅仅关注眼前的情报作战任务。有了研究和思考的机会，我更好地理解到，这个世界正在迅速转变，尤其是在冲突、风险，以及竞争与合作

的性质方面。但有一个共同点：情报的价值增加了。2001~2002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趋势的改变，大多是由技术的迅猛进步推动的，这表明情报会在日益相互依赖的复杂世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我们对于情报的集体理解和赞赏，远远落后于我们国家的需要。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经常如此。

美国及其盟友于1989年11月赢得了冷战，“铁幕”^①崩溃之后，许多责任心强和受尊敬的领导，如已故参议员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对于是否需要强大的情报表达了他们的怀疑。有些人质疑秘密行动机构的必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兑现“和平红利”，情报预算削减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身为一名经历了这10年预算崩溃的现场行动人员，我亲眼目睹了业务的无休止搁置和情报网络的凋零。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关闭情报站。仿佛我们的领导人预计地缘政治风险行将消失。

一些中情局领导人大声质疑他们的任务含糊不清。有些人因困惑和厌恶而跳槽。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情局资深人员甚至接受了新世界没有真正敌人的观念。中情局秘密行动部一位科长米尔顿·比尔登（Milton Bearden）宣布，俄罗斯不再构成任何重大间谍威胁。他的观点越来越吃得开，直到一连串俄罗斯的渗透活动被曝光，如奥尔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渗透进中情局、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渗透进联邦调查局。这些叛徒让美国国家安全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还向俄罗斯人提供了情报，导致为美国中情局工作的十多名勇敢的俄罗斯特工遭到处决。虽然美国与俄罗斯合作，就像与中国合作一样，好处显然更多，但间谍活动的存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大国是美国在外交、科学、商业等方面的合作伙伴。从间谍活动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敌人。俄罗斯和中国都可能有更多的秘密情报人员在美国境内，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比在冷战高峰时还要多。

① 铁幕，指前苏联东欧集团。——译者注

然而，在冷战后的繁荣平静期，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享有了自以为存在的喘息机会，在一个虚构的幻觉世界里，没有严重的威胁和致命的敌人。制定政策的书呆子们奢谈美国无可匹敌的霸主地位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自由市场原则普遍盛行、势不可当、不受阻碍地阔步向前。生活是美好的嘛！

随后，基地组织袭击了美国本土，就在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和他的19名劫机者杀害了2977人。罹难者大多是美国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一些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等在那一天殒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被摧毁，在堆积如山的城市废墟中，散落着支离破碎的人体遗骸。一些受害人选择跳楼赴死，他们牵着手，避免被烧残或在大楼倒塌时被压死。华盛顿以外，地球上最伟大军队的总部五角大楼遇袭，它的一侧被撞出了一个深深的黑洞，冒着浓烟。美国的男女军人死伤者不少，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整个走廊。

美联航第93号班机的英勇乘客，在这严峻的一天是唯一的有效应敌者，他们制服了劫机者。但最终飞机失控，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农田触地爆炸。这支平民队伍，成为一个自发组织的非国家行为体团队，他们用手机收集情报，分析他们的处境和风险，策划和执行了一次大胆的反击。飞机上的33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死了，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其中可能包括我们首都的政治领导人。

美国 and 全世界感到震惊和愤怒，努力揣摩着这次袭击意味着什么。这个敌人是谁？为什么？美国为保护其公民做了什么？可以做怎样的回应？

那个可怕的日子，使人们重新意识到我们并不安全。人们想知道，他们的社区会不会被攻击。对我们家园的侵犯，引发了一场关于战争与安全的辩论，焦点是情报。国会后来成立了“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强调情报的作用。该委员会的结论和领导人的意见很清楚：“9·11”事件是一个巨大的情报失误，而不是政策失败，探索政策不在委员会的职责之内。

委员会和政策制定者中的许多人曾经投票决定削减情报预算，但现在异口同声地说：情报出了岔子。现在要紧的是情报。美国需要更多的资源搞情报。

自“9·11”事件以来10年间，美国情报部门的预算和官僚机构没边儿地增长，且复杂和混乱，简直就是群魔乱舞。到2011年，每年的情报部门预算从数十亿美元激增至750亿美元。一夜之间，美国的政治领袖成了情报工作的吆喝者。他们成立了更关键的委员会，花了更多的纳税人的钱，订立了更多的规则和条例，并建成了更多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机构和部门，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国家反恐中心（NCTC）和美国国土安全部（DHS）。

与此同时，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与国会一起，选择性地滥用中情局争取政治利益，对中情局提出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乔治·W·布什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试图破坏中情局卧底官员瓦莱丽·普莱姆（Valerie Plame）的信誉，甚至威胁其人身安全，只因为其丈夫乔·威尔逊（Joe Wilson）大使曾公开批评布什领导的白宫。不管是为了政治利益，还是其他原因，白宫官员怎么能危害中情局官员不可侵犯的掩护身份和生命呢？怎么能危及她的特工网络呢？其网络中的外国人还正冒着生命危险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呢。白宫高级顾问“滑板车”刘易斯·利比（Scooter Lewis Libby）因为不配合泄露事件的联邦调查行动，被判刑入狱了。

除了这可怕的失信行为，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团队全盘接受了美国中情局的情报及其情报服务，尤其是在这些服务符合政府政策期望的时候。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与白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有点太密切了。我在戴维营、白宫战情室，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布什总统汇报2001~2002年度情况时，他总是询问有关行动，鼓励我和我部署在阿富汗的人。他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道义上的重要支持。他怎么能允许，或许纵容，对中情局卧底人员的政治攻击呢？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月上任，他的司法部以入狱收监威胁中情局官员，因为他们执行了上届政府的合法命令。这是试图将先前的合法政策视为刑事犯罪，并作为对中情局的一种惩罚吗？还是仅仅为了政治利益而把情报人员推来推去？

司法部的检察官们已经调查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何塞·罗德里格斯（Jose Rodriguez）超过两年，这是一位可敬而勇敢的领导者，结果没有发现他有

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政治聚光灯暗下来后，他们只得作罢。

尽管当时的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极力反对，每一位健在的前中情局长也极力反对，奥巴马总统还是公布了已由上届政府批准并指导的强化审讯技术的细节。奥巴马政府试图讨好民主党人，却牺牲了中情局及其情报人员。

奥巴马总统越来越倚重中情局。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下达的在南亚发动的对特定目标进行打击的命令，比布什总统整个任期内下达的还多。奥巴马让中情局负责追查和杀死更多的恐怖分子，并在任务胜利完成后，打电话给每一个行动人员以示祝贺。他开始逐渐信任中情局的评估，而且得到了回报。中情局发现了本·拉登，这让奥巴马总统获得了作为总司令捞取非凡的政治声誉的机会。他果敢地下令中情局和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发动武装行动，在2011年5月1日将本·拉登诛杀于他在巴基斯坦的藏身之处。

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间，欧洲盟国加入了政治上的反情报争吵，他们起诉中情局官员，而忘了自己的情报官员也参与了变味儿的联合行动。意大利就是最好的例子，中情局怀疑这位外国情报合作伙伴及其政治主人的可靠性。与此同时，外国情报和安全部门也在盘算着他们能在美国情报界里信任谁。他们自己在辩论，哪个美国机构负有什么责任。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出现了那么多媒体泄露事件，高级情报官员及各种机构和部门的混乱扩张，角色繁多，迷惑重重，授权重叠。例如，新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没有规定其要与美国各情报机构协调一致，却获得了一个礼宾员的班子，接待来访的外国联络官员。该机构后来膨胀到3000余名工作人员和承包商，他们大多要找事来做。

就在后方，美国公众的情绪变化很大。美国公众钦佩中情局官员，尤其是对于其在对付基地组织渗透到公共领域方面时起到的主导作用表示认可。“9·11”事件后为国而死的第一位美国人，就是中情局准军事人员约翰尼·迈克·斯潘（Johnny Mike Spann）。国内对于这位倒下的美国英雄有广泛的新闻报道，礼待有加，这是理所应当的。对于我们中情局的人来说，损失尤为严重，因为迈克是我

们所钦佩的人，他无私且无畏。

然而，“9·11”事件之后只过了几年，美国和它的某些领导人对中情局的态度就变得模棱两可。某些部门对情报工作的怀疑和反感也日益增长，特别是审讯技巧和暗杀行动。他们对于在国内搞情报也有合理的担心，因为这里情报工作并不常见，且挑战公民自由。

大众媒体及娱乐业炒作、歪曲情报活动的方方面面，从塑造超级英雄到炒作可恶的情报人员形象，嘲讽他们能担负的任务。

更根本的是，政治领导人和律师们想方设法确定我们是否真的与基地组织开战了，如果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敌人。他们是归属于民事法庭的罪犯呢，还是应该被运到关塔那摩人间地狱的敌方战斗人员？为什么他们批准中情局操作无人机去杀死指定的敌方首领（也许还包括他不幸的家人）却反对中情局官员在审讯过程中剥夺敌俘的睡眠，并要法办那些违规者？

为什么中情局处于这一冲突的最前沿？这不只是情报收集，而是全球范围的庞大隐蔽行动。为什么搞这么多的秘密行动？其他的统治工具呢？

我参与了一些谍报行动和政治冲突，尤其是在“9·11”事件前后的阿富汗。无论是在外地效力，还是在首都华盛顿，我经常坐上靠近拳击台的座位，带着敬畏和厌恶观看美国的情报任务和对外政策的一波三折，他们试图保家卫国，但有时也添乱。例如，公然入侵伊拉克，接着是软弱而有气无力的占领，把“9·11”恐怖袭击后来自全球的对我们的同情破坏了，也把我们最初在阿富汗的成功所获取的钦佩和美誉弄砸了。

这一切的根源，似乎是决策者、民选官员和领导人对情报欠缺了解，无论是在政府中，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里。我不知道哪些属于诚实的无知，哪些属于政治家、记者、艺人与奸商的玩世不恭和操纵。如果情报在我们的国家安全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日趋重要，如果市民需要了解这门神秘的艺术，那如何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点呢？

这正是悖论所在。由于情报人员，尤其是中情局的秘密行动部，对于保密具

有的功能和文化方面的偏向，情报界领导人经常驳回公众宣传或教育方面的需求。政治领导人普遍会加强这样的态度，不想有任何存在分歧的专家意见在公共领域露面。事实上，政治家要确保情报为己所用，甚至对自己内部都严格保密。这种必要的保密性，特别是在涉及情报来源和方法时，往往阻止了公众更深入地了解情报。

西姆斯博士在她上课期间和下课之后，和我讨论了这个悖论。我们还讨论了情报的伦理。我把她介绍给了伯顿·格伯（Burton Gerber），那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退休的中情局间谍头子，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旁听了西姆斯博士的课，还做了间谍伦理讲座。这引发了一场重要的辩论。

西姆斯博士和我一致认为，情报研究还不成熟。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点，更多的资源，更加突出重点，还需要生动活泼、礼貌恭谨且见识透彻的讨论。我鼓励她整理和编辑情报教材，这是她早就在考虑的东西。她说服伯顿做合编者。我同意在书中写几个章节——“情报与战争：阿富汗 2001~2002”和“国土情报和安全”，该书为《转型中的美国谍报工作》（*Transforming US Intelligence*），由乔治敦大学出版社于 2005 年出版。

该书成了这家出版社的畅销书，也成了有志于从事情报学术研究的人的有益教材，这群人很重要但人数相对较少。我对自己的微薄贡献感到自豪。

学术休假结束后，2003 年我又回到了秘密行动部，担任了两年的国家资源司司长，这个单位是中情局最敏感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家资源司在美国各地设有办事处，与美国执法机构、美国公民、各种官方与私人机构合作，推进秘密行动部的任务。我对祖国有了新的认识，加深了对中情局的好感。我也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了解到私营部门在国家安全上的核心地位。作为资源科科长，我看到了美国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而它带来的赢亏效应则日益全球化了。美国私营部门的高管和专家在五大洲各个角落工作，他们在异国他乡建立的广阔渠道和因此带来的深入理解，让我刮目相看；在情报方面公共/私营的相互依存，让我瞠目结舌；其情报资源和我们可能掌握的情报的丰富程度，也是超乎想象。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局限性似乎在于，对于情报缺乏负责任的公开研究和对话，特别是情报在性质不断变化的风险中的作用。民间的确有呼声，但往往是不知情的，另有政治动机的或者愤世嫉俗的间谍老手在说话，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已不符合他们的思想观点或职业期望了。

作为一名秘密行动部的官员，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责任。我被官方禁止从事任何关于此类问题的公共宣传。此外，我又在学术教材中写了几章，已经打了中情局的文化规范限制的擦边球。

2005年，形势所迫，我开始扮演起公众角色，这让我没有预料到。国务卿赖斯让我做反恐协调员，级别是无任所大使。这是总统任命的，需参议院的公开确认。我接受了任命，这意味着我的间谍生涯结束了。

我从秘密行动部这个封闭的秘密世界一跃站上全球公开外交的舞台，成为总统和国务卿的反恐政策代表。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从间谍到外交官，从秘密行动到公开的国际电视采访，从一大堆的化名到高贵的称号。最重要的是，我从情报收集者转变为情报的消费者，从行动人员转变为政策顾问、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当布什总统第一次在国务院见到我时，他问国务卿赖斯：“割喉者做了外交官？他能行吗？”

我曾在许多不同的机构和部门做反恐工作，我了解跨部门工作程序，所以从行动到政策操作的过渡并不难。我多年浸淫在全球反恐行动中，这对于与许多国家的合作关系也有助益。在替国务卿赖斯工作的18个月期间，我大部分时间在海外旅行，与我们的大使、军事指挥官和外国合作伙伴协同工作。在这种转变中，可能有一些失误，但我努力学习和提高。不过我的经验和对这项工作的理解之间有较大的差距。我大大低估了这一使命对公众的及其分量重要性。我主持了100多次世界各地的采访和新闻事务。国内外观众似乎渴望有人来参与，并讨论反恐政策和情报的支撑作用。不管怎么样，他们希望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倾听他们的声音。

在这个任务中，我感到震惊的是教育和负责任公开讨论的重要性。我勤奋工

作，在这些开放的论坛，代表我的国家，从波哥大飞往柏林，再到贝鲁特，与公众沟通。

2007 年从美国政府机构退休后，多亏同甘共苦的妻子多年的支持，我转移到私营部门工作，来支付孩子们的大学学费。我也想享受更大的灵活性，能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我突然意识到，我琢磨敌人的时间超过了思考其他人，这一下子“击中了要害”。为政府服务 26 年后，退休是正确的选择。

然而，我的心里将永远珍视自己在中情局的经历。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项伟大的使命，一种生活方式。情报服务除了给我带来荣誉和特权，那种爱国之心，还有随之而来的责任。由于我独特的经历——先后任职于反恐、学术界、自然资源、公开外交和私营部门，我觉得自己对于教育工作责无旁贷，尤其是考虑到地缘政治冲突方面的巨变改变了对于情报任务和情报人员的相关要求。

悖论依然存在。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如何在遵守保持静默的文化规约的前提下，同时寻求晓谕公众，从而促进他们理解和支持情报界？我寻求在二者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那就是作为一名退休特工享有的光荣的自由裁量权和作为一名积极公民的公共责任。

我退休时，并不打算写书，但拗不过文学经纪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lie）和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还有其他人。斯科特第一次是在平面媒体读到我的。然后，他做了一些研究，比如给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比尔·哈洛（Bill Harlow）打电话，后者担保我能够成功。哈洛曾经在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手下做中情局公共事务官，令人敬仰。斯科特和安德鲁邀请我去他们的纽约写字楼，说服我可以而且应该把我的知识作更多的分享。

依托于回忆，并添加其他参与者的最新讨论资讯之后，我写下了个人的故事，传达关于情报、战争、政策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解。这些故事有我直接参与的，也有我当时指挥的手下人员参加的，作为围绕“人”的故事也值得一看。当然，情报最终是关于人的：那些从事间谍和秘密行动的人，那些分析情报的人，以及那

些使用情报的人。情报也涉及那些招聘目标和外国特工，以及那些从谍报行动和从好的或坏的情报形成的政策中受益或受害的人。

本书的第一部分涉及基本业务。我 24 年的情报收集工作最受关注，主要是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谍报最有争议的方面，即秘密行动，也值得大谈特谈。我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秘密行动是在 2001~2002 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它作为主要例子有几个原因。首先，我发挥了领导作用，写这些有权威性。其次，这场冲突可以作为谍报案例融入秘密行动、战争和政策的优秀案例研究。这场战争是未来的窗口，是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敌人和盟友以及非敌非友的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的代表。第三，因为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等人，关于这场战争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的信息量，可以用来讨论原本禁止讨论的题目。第四，人物扮演了戏剧性的、引人注目的角色。第五，南亚将多年维持美国国家安全关键地域的状态，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本书还勾勒了一个充满风险的新世界，以及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的作用。这包括探究战略原则、情报和政策之间复杂的动态过程。本书还回顾了冲突、情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通过讲述我职业生涯中的经验教训，外加他人的一些经验和意见，我希望大家了解谍报术有所启迪。我试图说明谍报的价值，以及它如何能够保障自由制度，并推进我们日益网络化、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社会。这本书也将介绍情报人员对我们国家的价值。

本书的英文书名是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故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礼赞，他在 1961 年写了《情报术》（*The Craft of Intelligence*）；也献给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军事家孙子及其《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杜勒斯的书，第一句话就是引用孙子的。我也感谢指导过我的许多其他人士。

毕竟，情报不完全是新玩意儿。

孙子强调，兵法为国之大事，是国家所需要的。他还说，“兵者诡道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里他指的就是情报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道理今天仍然奏效。战争和情报不仅对国家越来越至关重要，而且对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而言也不可忽视，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冲突时代，它有独特的特点和要求。

因为这种划时代的转变，情报世界处于大变革之中。我们的情报界被冲突与合作的新势力东拉西扯，为不断变化的政治利益所扭曲，但仍在尽量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美国，此综合征尤为严重，社会对情报的作用持有不同的期望且各持己见。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我们想到间谍时，夹杂着尊重、浪漫、理解、无知、怀疑、恐惧和厌恶。就像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的：“我们有情报过敏症。”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努力理解和支持情报机构和情报专业人员。

随着战争的性质继续转变，谍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全体公民，而不仅仅是政府官员，需要更好地掌握情报，包括其作用和它的极限。更好的情报可以保护和促进美国和我们盟国的利益，有利于促进全球的自由民主。这就是我为国家服务的理由，是我时至今日仍然信守美国宪法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我写这本书的理由。

我希望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你们！